

## 东亚国际秩序的共建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张云

**内容提要：**近两年来，“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似乎成为主要国家之间相互指责的便利的习惯用语，同样在亚洲，中日关系的动荡也伴随着双方指责对方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激烈批评的交锋。究竟谁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现行东亚国际秩序是什么？是否还继续有效？如果有重建的必要，那又应该如何实现？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从全球层面入手分析，认为尽管战后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制，但实际上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治理机制是两大功能维度和三大地理区域各种有限的国际秩序的叠加。第二部分从东亚地区层面入手，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对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认知鸿沟是中美日三边关系近年来摩擦不断的知识根源。第三部分，在肯定“旧金山体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分析其局限性日益突出造成在政策实践中中美日战略互疑的加深。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新的东亚国际秩序建设过程的不确定性导致日本产生战略不安，指出这是中日关系近年来面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冲击的结构性原因。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为什么让日本逐渐实现“战略自主”将是建立东亚新型国际秩序的必由之路，并探讨了日本实现“战略自主”后的风险是否可控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秩序 东亚 中美日 战略自主

近两年来，“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似乎成为主要国家之间相互指责的便利的习惯用语。中国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国有化是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否定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公然挑衅；日本指责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在南海的岛礁填海行为是单方面用力量改变现状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和欧洲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行为比作是在战后欧洲安全秩序上“挖了一个大洞”；而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地批评北约东扩破坏了战后欧洲国际秩序。这让人感到很迷惑：究竟谁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到底有没有国际秩序？如果有，那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是否还继续有效？如果有重建的必要，那又应该如何实现？战后70周年为我们深刻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机会。

## 理解现行国际秩序的两个维度和三大地区

同国际关系中很多概念一样，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但没有获得定义共识的名词。本文并没有雄心壮志确立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是希望从务实的角度来回答我们讨论的起点——到底有没有国际秩序，如果有应当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从形式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在政治安全上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在经济社会上建立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为代表的国际机制。但是，在实践上具有全球性质的国际秩序并没有真正存在，高覆盖和普惠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治理机制是两大功能维度和三大地理区域各种有限的国际秩序的叠加。

从功能维度来说，可以分为政治安全与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在经济社会领域，一方面以上述国际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具有全球治理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决策实践中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以“七国集团”（G7，更严格地说是美国主导下的五国集团，即：美、英、法、德、日）为基础，这种状况在冷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七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经济的七成左右，重大问题一旦七国集团决定后就会带来全球结果。这种事实上以七国集团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显现严重的局限性和力量不足，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诞生了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政治安全领域，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机制并未真正起到当年创始者们设想的保障集体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冷战中，美苏争霸取代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而苏联解体后，国际安全秩序凸显了以美国为核心、以双边军事同盟网络为支柱的相互独立的地区秩序的叠加。这种状况主要体现在欧洲、亚洲和中东三大地理区域：欧洲地区秩序建立在美国同北约的双边军事同盟网络基础上；亚洲秩序同样建立在美国同一系列东亚盟国的同盟网络基础上；中东地区秩序则是建立在美国同中东主要国家强人政权长达几十年的准军事双边同盟网络基础上。这种事实上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同盟网络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安全秩

序的局限性日益明显。2001年的恐怖主义袭击暴露了这个秩序无法有效地对应恐怖主义等新型威胁；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德法等欧洲盟友反对美国开战，这显示该秩序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内部质疑；这个秩序在2011年的西方媒体所谓“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面对2012—2013年的中日关系空前对抗也无能为力，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也没有起到建设性作用。还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三大区域外，现行的国际秩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拉美等其它地区处于事实上的准空白状态。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现行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作用，不能够认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完全失效，另一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近年来频现的各种国际对抗、摩擦、紧张和问题，实际上凸显了现行国际秩序对应能力不足和治理机制缺位的本质。特别是国际经济全球化深入与国际经济决策形成机制的民主化不足之间的鸿沟，以及国际安全挑战的复杂化与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地区同盟安全机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换言之，国际秩序已经到了需要升级更新的关键时刻。

### 现状国家 vs 修正国家模板与东亚秩序的认知鸿沟

我们把目光从全球层面转向东亚，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围绕国际秩序的相互指责不断。特别是美日在指责中国的时候经常使用“现状国家”（status quo nations）对“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nations）的修辞模板，即认为自身是维护国际秩序的现状国家，而中国则是破坏或者挑战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不能否认这种分类具有简单明了的冲击力，然而过于简单化的区分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不具有建设性。对于究竟什么是“现状”，并没有定义，也缺乏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区分现状和修正主义，逻辑上是错误的，如果用在政策上更将具有误导性。以中美日为代表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其根源不在于谁是修正主义国家，而在于对东亚秩序认知的鸿沟以及未来东亚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美日来看，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就是美国建立的所谓的“旧金山体制”（San Francisco System），这个体制的基础是美国主导对二战后处理。在政治安全上，美国同东亚海洋国家通过双边军事同盟构建了“轴心—轮辐体制”（hub-spokes system），以向这些盟国派驻美军和设立军事基地的“前方军事存在”（forward military presence）为主要形式，实际上建立了以美国海军将西太平洋作为美国“内湖”享有绝对的军事行动自由为特征的东亚海洋秩序，而日美同盟是这个秩序的基石；从经济社会角度来看，本地区没有建立类似欧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机制，在冷战中经济秩序实际上建立在不具有可视性的美国—日本—东南亚三角经济依存关系上，即美国主导下日本同东南亚迅速解决战争处理问题后，东南亚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日本扮演大量生产的加工基地角色，美国则为日本的产品提供巨大市场，这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安排的经济

秩序，而是建立在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和资金为特点的“单项依存”（unilaterally dependence）非正式的经济秩序。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也迅速加入到这个秩序中，并在融入这个秩序的进程中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并不完全认同上述“旧金山体制”作为东亚国际秩序基础。一方面，中国认识到这个体制的经济层面为中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和快速崛起提供了巨大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这种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但是，“单项依存美国”的非正式的经济秩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在经济转型压力日渐吃紧的情况下，中国近年来积极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为了改善经济秩序中不平衡的风险，而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但是对于“旧金山体制”的政治安全层面，中国的不满则日益突出。从历史上看，该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并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的东亚国家也不在其中，这是一个片面的小圈子类型的局部安排，不具有广泛性和完整的合法性。2001年，钱其琛副总理曾经精辟地指出过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在亚洲大陆的边缘一个由半岛、岛屿组成的链条”。<sup>1</sup>从性质上看，强调军事层面的“旧金山体系”的强化将会倾向于依靠设定假想敌为基础获得凝聚力，苏联解体后这个体制的任何的扩大都会被中国看成是遏制中国发展的敌意行为。2010年起中美在东海、南海的摩擦，以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都让中国人越来越觉得这个体制特别是日美同盟正在成为美国钳制中国的工具，而不是维护本地区和平及保障安全的有效安排。

日美同盟不是维护本地区和平、保障安全的有效安排。

2015年5月28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当采访者提及美国之所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频度的侦察活动是为了“保护盟友”时，崔天凯大使说，按照这个解释那“就意味着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本质上是以反华为目的的。如果这些军事同盟致力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并与所有地区国家开展合作，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做现在这些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军事同盟将中国看作对手甚至敌人。这是最危险的。”<sup>2</sup>这可能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高级官员首次公开明确地对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的强力负面定性。当然，崔大使在之后补充说明：重要的是美国的行动不要让中国人确信这些同盟关系是针对中国的，但这足以证明中国对于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近年来，中国领导人还提出“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

从上述的中国与日美之间对东亚国际秩序认知鸿沟的框架就容易解释这几年来三边关系发展的很多现象。例如，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对钓鱼岛（尖阁

1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02/c\\_12787020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02/c_12787020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4月19日。

诸岛)“国有化”后,中国首次使用了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定位批评日本。在日本看来,该岛屿在1972年冲绳行政权回归过程中已经由美国一并归还日本,这是“旧金山体制”内的一个所有权调整而已;而在中国看来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该体制的建构过程,上述行为属于日美之间的私相授受,没有任何合法性,也绝对不能够接受。而美国则采取了“主权上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和日美同盟适用的“中立态度”。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相互测试战略意图的重要的指标,根本原因还在于东亚的真正国际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再则,2013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同样道理,表面上看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针对日本,然而真正的对象是美国。中美日虽说是三边关系,然而由于日美不对等的军事同盟关系,从结构上可以简化为中国对日美同盟的双边关系。美国在本地区很早就划定了防空识别区,而后在日本重新“独立”和归还冲绳的过程中将防空识别区名义上交还给日本,但是这完全没有妨碍美国把西太平洋广阔海域当成自己的“内湖”进行超乎寻常的自由行动。所以,目前日本所宣称的防空识别区,事实上可以看成是美国在北美的防空识别区的延伸。

## “旧金山体制”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旧金山体制”内美国的东亚同盟网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大致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台湾地区7个条约同盟。需要客观地承认,这个双边同盟网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第一,在冷战中这个网络为东亚的海洋部分提供了基本的国际秩序,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机会。由于同美国结盟,这些盟友不需要过度担心国家安全,而美国巨大的市场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可能。这些盟友在冷战中能够实现高速发展同美国的同盟网络有很大关系。第二,这个同盟网络遏制美国部分盟友可能出现的“莽撞行为”(reckless behaviors)而导致地区局势失控。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后,日本和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发展核武器,同美国对于盟友的约束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

冷战结束后“旧金山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日趋明显。

代基辛格博士访华时劝说中国方面接受日美同盟的一个理由就是可以管住日本,周恩来总理对此至少没有完全否定,这就是对美国同盟作用的一种默认。但是,冷战结束后“旧金山体制”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日趋明显。

第一,“旧金山体制”覆盖面小,包容性弱,无法提供冷战后东亚所需要的安全架构。

冷战开始后,美国一直努力希望将“旧金山体制”扩大为真正的东亚秩序,但是实践上并不成功。冷战中,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在东南亚建立以反共为目的的

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以及越南战争、柬埔寨政变等方式扩大这个体制，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1967年，东盟成立实际上意味着东南亚地区事实上选择了走一条通过战略自主来治理地区的次区域秩序（sub-regional order）建设的道路，也意味着美国在东南亚扩大“旧金山体制”的失败。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 and 台湾地区同盟关系消亡。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与美国同盟关系实际停止。90年代初，菲律宾将美军在苏比克湾基地收回。因此，“旧金山体制”目前真正有实际同盟意义的主要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3国，在过去几十年这个体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如前所述，美国的亚太盟友主要在海上，美国在东亚陆地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这个网络可能可以为这些盟友提供安全，但冷战后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多样的，而美国的双边网络能够做的很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些年努力希望建立更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盟友之间的三边架构，例如日美韩、日美澳，等等。这些三边框架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去单纯双边的缺陷，但是从覆盖面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旧金山体制”除了缺乏广范的覆盖性外，其包容性弱也是致命伤。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中美成为“准同盟”，美国试图将中国逐渐包容到“旧金山体制”中来。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美在经济和军事交往上的良性互动，然而冷战出乎意料的迅速结束打破了美国的计划。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不仅没有来得及包容中国，相反越来越让中国认为这是一个阻挠中国发展的反华性质的工具。然而，没有中国参与的地区秩序无论如何都不具备可持续性，正如欧洲的地区秩序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样。

第二，“旧金山体制”日益明显的军事同盟和经济依存之间的反向背离（divergence）意味着这个秩序的发展和深化不具备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旧金山体制”在建立和发展期间体现了军事同盟和经济同盟的高度同一性，即美国同时是前述最初的7个国家和地区同盟伙伴的安全保证者（security guarantor）和市场提供者（market provider）。现在，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是中国，政治军事同盟和经济依存对象的反向背离正在强力地拷问这些美国盟友的认同，并且带来战略决策上的两难，这种身份认同的混乱和迷茫实际上也在削弱这个体制内在的动力和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试图将双边同盟升级为三边和多边同盟不那么成功的原因之一。

军事同盟以共同威胁为导向，这在冷战后已经失去以往的号召力。尽管美国常常将朝鲜和中国描述为地区共同威胁，但至少在亚洲并不存在“共同外部威胁”。例如对于韩国来说外部威胁显然是朝鲜，而对于菲律宾来说朝鲜的核威胁几乎不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可能认为中国是威胁，但对于韩国或者泰国来说，中国更多的是最重要的经贸关系伙伴。

第三，“旧金山体制”在促进地区和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是双边同盟网络，东亚国家和解互动的动力严重不足，这也是亚洲历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

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日韩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为地区和解起了一定作用，那么双边同盟关系在冷战后越来越显示出其调停亚洲国家之间关系上的乏力。这一点在日韩关系和中日关系上体现最为明显。韩国对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上的不满让日美韩三边同盟的转型迟迟没有进展，韩国和日本都在一直争取美国在竹岛/独岛问题上明确支持自己的主权主张，但美国不愿得罪任何一方盟友结果让双方都不满意。在中日关系上，美国一方面对日本再三保证日美安保同盟适用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另一方面又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日来说都很难信任这个被认为有“偏见的中间人”（biased broker）。对中国来说，美国似乎越来越像一个搬弄是非，鼓动盟友的霸主而非原来那个能够管好鲁莽盟友的善意盟主。

第四，“旧金山体制”越强化，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反而越深化。苏联的解体让地区安全局势得到极大缓和，为什么美国仍然需要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呢？这个疑问同盟友内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了菲律宾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湾军事基地，日美同盟同样经历一段“漂流期”。然而，美国担心双边同盟网络的瓦解意味着将会失去本地区施展领导力的基本平台，朝鲜核问题以及“台海危机”为美国继续这个网络提供了极好的背景。1997年，日美修订了安全合作指针，提出了“周边有事”的概念，加上美国通过1979年《台湾关系法》延续的同台湾地区的某种“隐形盟友”关系，中国高度警惕美国的同盟网络是否开启了阻挠中国统一的大门，中国对“旧金山体制”态度转变由此开始，并在过去20年里从此前的默认转为怀疑，并逐渐走向反对。近年来，东海和南海争端以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让中国越来越怀疑美国的意图是怂恿其盟友形成把中国作为共同外部敌人的共识，以此来维护盟国间的凝聚力。所以，当前中美战略互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旧金山体制”的分歧。

## 新秩序的构建与日本的不安

现行东亚秩序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已经成为刚性需求，从美国角度来说一方面不愿意改变原有的利益结构，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必须要建立新的方式来对应变化。

从经济秩序来说，原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单向依存模式已经日益不适应现实。实际上这个经济秩序遭受过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日美经济摩擦严重，最后日本采取日元贬值而不是双方共同改革的办法把结构性问题（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暂时压下来了。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游资的冲击造成很多国家受到重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苛刻的救援条件造成本地区加深了对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不信任，客观上也催生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第三次是2008年的世界

经济危机，美国需求减少的经济影响让东亚认识到，以美元和美国市场依存为特点的东亚经济秩序不可持续，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提高东亚国家生产力和拉动本地区内需来实现。

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前者在现有的美日主导的经济秩序下融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中国倡导创设了亚投行；后者在现有的单向依存美国模式下不可能造就产业升级。而从长远来说，美国近年来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有利于东亚各国转变发展模式，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在经济秩序重建上尽管“殊途”，但最终目标很可能是“同归”。现在尽管美国尚未加入亚投行，但也没有对此排斥。中国并未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但也抱着开放的态度。中美之间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定期沟通，积极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这些都说明了在新的经济秩序建设上中美有积极合作意愿的体现。经济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可谓“多选项题目”(multiple choice question)，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国家既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又加入亚投行，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显示出各方共建的经济新秩序已经初露端倪。

从安全秩序上来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不仅难以应对很多新的安全威胁，而且日益成为中美之间相互猜忌的催化剂，一旦处理不当都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导致冲突升级。双方很清楚现实危险的存在，因而近年来在军事信任方面有不少重要举措，例如2014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美双方签署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互信机制文件(“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2015年两国努力落实制定“空中相遇安全准则”。形成对照的是，中日海上危机管控则因为双方最高层严重缺乏政治互信而陷于停顿。中美的上述良性互动很可能为本地区的海上危机管控机制树立示范效应，一旦成功就可以推广为地区规范，为海洋地区秩序奠定基础。同经济领域不同，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很多时候是单选题，中美之间能够就一些原则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并且形成规范(norms)，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可以避免或者少做单选题(single choice question)。

中美之间既有严重的战略互疑，又有建立最高层战略互信的强烈意愿，既有海洋安全问题上的阶段性的紧张对峙，又有努力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行动规范的高度期待，这对在大战略上长期依靠日美同盟、在国家认同上定位为美国最重要东亚盟友和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带来了对未来自身战略地位的强烈焦虑。

日本原有国家认同受到前所未有冲击，以及对未来秩序的不确定和焦虑感不仅是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的部分原因，还反映在日美关系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上。例如对于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比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更加激烈；对于亚投行的设立，日本的拒绝性比美国更强；而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则不断

地要求美国反复承诺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如果日本在战略上对美国完全信任，就不需要这样的反复确认。

## 东亚秩序共建与日本战略自主

中国反复强调没有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也一直表示愿意尊重历史上形成的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存在，但是需要对现行秩序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以反映中国的诉求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表明没有意愿去扩展现有的同盟网络，美国领导人公开说过不会在亚洲寻求新的永久性军事基地，美国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更多的可以从战略调整而不是战略扩大的角度来理解。

中美在未来的东亚国际秩序建设中的确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美国担心失去原先在本地区的特权和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在政治安全上表现为西太平洋上的绝对的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在经济上则体现为美国提供市场和资金，亚洲提供生产基地的传统结构；而中国不愿意继续忍耐美国在中国近海的高强度侦查活动，以及在经济上要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过度，并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中国的利益。这种结构会让双方的战略竞争和博弈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下去，但也要看到中美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因为双方在东亚国际秩序问题上战略诉求基本上还是防守，而不是进攻。双方领导人也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意愿要通过构建新型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定可确定性。

在东亚新秩序的构建中，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实际上是日本。这并不是说日本具有同战前那样通过军国主义和军事扩张来构建地区国际秩序的进攻性意图与计划，而是前述日本对自我国家认同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致。近年来，日本的很多行为更多地体现为维护原有国家认同的意图，在经济上强调七国集团的凝聚力以及对亚投行的高度质疑体现了作为发达经济体一员的国家认同，在安全上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则体现和强化了作为美国盟友的国家认同。问题在于，日本这种保守的方式很可能无法给日本带来所希望的安定感。安全上同美国的一体化不一定会带来日美关系的对等，也不一定会让美国愿意卷入中日领土纷争，而经济上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拒绝亚投行可能会让日本更加孤立，结果会带来日本战略失望。而这种失望有可能会造成日本国家认同向着自己都不愿意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中美日三国和本地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从现阶段来看，中美日三国都没有进攻的意图，但是保守地将希望寄托在原有逻辑上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三国需要的是创造性思维。如何减少日本对于未来的不安，首先当然需要日本努力调整自我定位，与此同时，让日本成为建设新秩序的积极贡献力量应该成为中美的共同战略责任。日本战略自主，而不是继续在大战略上完全依靠日美同盟，应该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长期的基本定位。这不仅需要日本大战略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样需要中美战略范式的创造

性思维。要帮助日本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实现国家认同的转型。要明确向日本发出信号，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来一起共建，而不是中美建立所谓“两国共治”（G2）。

长期以来，日美同盟除了对应外部共同敌人的目的外，中美之间存在一个战略默契，即中国认可美国主张的日美同盟将能够限制日本独立安全战略和军力发展，从而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瓶塞理论”（Cork Theory）。这个思维范式的背后实际上是冷战思维的另一种体现，核心仍然是遏制。从今天的中美日关系态势来看，“瓶塞理论”基础上的同盟关系不仅不能维护人们传统意识中“稳定”，相反已经成为带来不稳定的来源。笔者认为，日本逐渐实现“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是建立东亚地区新秩序最终不可避免的路径。

让日本逐渐实现  
战略自主是建立东亚  
新型国际秩序的必由  
之路。

第一，战略自主目的在于让日本在冷静地定义自己国家利益基础上，选择最佳道路实现国家利益。现在同盟至上的思维框架使日本陷入了战略思考停顿状况，不能够思考到底自己的国家利益何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相反把巩固同盟作为国家利益来追求，这是本末倒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美同盟剥夺了日本自我思考的机会。冷战时期，日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具备战略思维，但现在情况已经变化，战略思维的必要性已经获得日本各界共识，只不过对于如何思维尚未达成共识而已。

第二，战略自主实际上可以在给日本一个认真思考自身利益机会同时，也可能使得日本比较准确地定位同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关系。日美同盟依靠确定共同敌人的办法来维系凝聚力肯定不可持续，双方的众多利益是不重叠的。这种不重叠性首先源自美国的战略自主和灵活性，而美国的这种战略传统会让日本感到盟友的背叛，从而导致双方的战略互疑。依靠日美同盟去解决日本战略问题的想法本身会导致讨论问题时的军事化主导倾向，还会把美国人卷入麻烦。战略自主也并非日美交恶，而是指日本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处理国际事务，日美军事同盟不一定长期存在，而日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完全可以长期存在，这才能实现真正的日美平等。同时，获得战略自主的日本才会认真考虑中国在其大战略中定位，并冷静地思考如何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可持续的工作关系。中日关系新框架的建立不会导致中日结盟，美国也无需担心自己会被中日联合赶出亚洲。

第三，战略自主将有利于东亚地区真正的和解。日本如果有战略自主的话，那么日本就需要仔细地去研究历史。目前情况是什么都依靠日美同盟来看待国际问题，美国强化同盟关系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就历史问题实现和解的动力受损，也就是说这个同盟结构本身是不利于历史问题上的和解的。一个相对具有战略自主的日本可以认真考虑自己需要多少防卫能力，同时在外交上努力让邻国理解日本不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这些都会成为日本同周边国家历史问题和解的动力。

由于日美军事同盟的关系，日本每一次安全政策的改变都会带来本地区国家

的猜忌，再加上历史问题的摩擦，矛盾就会升级，日本就会感到不安全，从而设法测试日美同盟的可靠性，使得测试美国的保护意图变成了经常性的习惯，而美国在历史问题上无能为力，在军事安全上又不愿意卷入亚洲的领土纷争，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军事化的同盟没有给日本带来周边关系的改善，由于被包裹在同盟里，日本停止了战略思考。

日本战略自主不仅需要日本自身的努力和再定位，同样需要中美两国的理解。一个自然的问题仍然来源于“瓶颈理论”，即日本战略自主的风险问题。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任何政策选择都会有风险。但是现在毕竟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同的21世纪，日本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可能去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相反我们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些战略问题，下面笔者以设问的方式来分析日本战略自主后的风险。

### 一、日本会不会走向核武装？

从理论和技术条件上讲是可能的，在没有美国核保护伞情况下，特别是如果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进程继续，会激活日本的核武装论调。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日本如果认真而且自主地思考获得核武装后日本的安全是更多了还是更加少的问题，将会得出不走核武装道路的结论。若是走向核武装，首先，这意味着日本脱离核不扩散条约，这就将会被认为是挑战国际体制；其次，改变无核武国家地位将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特别是在2011年“3·11”特大核灾难后，就连民用核电站的正常运行都阻力重重，开发核武器更难有民意基础；最后，这会导致韩国等国家走向核武装，造成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急剧升级，危害日本的国家安全。

### 二、日本是否会在对华政策上更加强硬？

美国安全保护的可靠性降低，自然会促使日本追求加强自主的国防。但是日本与中国日益拉大的经济实力差距会让这种“自主国防论”不具备现实能力，也很难持续，这就要求日本认真地思考同中国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工作关系。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发展中日关系有益，因为中国不可能有永远依赖美国人来管住日本的思维处理对日关系。目前所谓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是日本设法实现战略自主的过程中的某种妥协方式，这肯定不是终点。日本重新定义国家认同并不会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结束，日本会发现此后的日美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

### 三、日本是否会同亚洲其他涉华争议方结成联盟反对中国？

这种策略的现实性并不强。如果日本感到中国的威胁增大，可以同菲律宾、越南或者台湾地区加强安全关系来应对，但是这种做法成本很高，也不可持续。没有美国的鼓动和支持，单凭日本号召力有限。越南和菲律宾虽然同中国有领土

争议，但是在经济上都不会放弃中国机会，它们都积极加入了亚投行，而且它们还受到东盟的规范。台湾问题是中国最为敏感的议题，一旦日本介入，后果大家都很清楚，何况台湾地区对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的立场与大陆相似。

目前，对于如何在战略上看待日本的基本思维范式似乎都停留在日美同盟的“瓶塞作用”的逻辑基础上。普遍的看法认为，若无日美同盟制约，日本在战略上会成为一个莽撞的没有规矩的“驾驶员”，这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国际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当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日本自身已经在怀疑日美同盟有效性的时候，原有的“瓶塞范式”也不可能持久。给日本一个战略自主的机会，这对于亚洲的国际关系将会是一次革命性的思维范式的解放。让日本各界认真广泛地讨论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也是帮助日本在战略思维上成长，最终受益者将是帮助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

基辛格说过，国际秩序是不能被强加的，而是需要培育的。(Order must be cultivated; it cannot be imposed)。<sup>1</sup> 笔者认为，国际秩序不仅需要培育还需要滋养(nurturing)，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动员所有参与方的热情。日本的作用应该看成一个可能做出积极贡献的利益攸关方，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是日本战略自主。客观地说，“瓶塞范式”可以看成也是“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通过遏制效应追求“消极和平”的冷战思维，而当代共建东亚秩序的目标是要建立“积极和平”。中美需要改变思路，不要固化地认为日本就是一个新国际秩序建设中的负担或者障碍，应多考虑如何帮助日本一起找到其合适的新定位，如何“借力”日本共同建设东亚新型国际秩序。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欧洲的新秩序不可能建立；没有伊朗的积极参与，中东的新秩序也不可能持久。同样的道理，若无日本的积极参与，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便无从谈起。这种新型的国际秩序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非意识形态化、法治化，人权，自由，民主都不应当成为给别人上课的题材，高度重视协商、对话，达成共识等东亚方式；二是非军事化，从根本上淡化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色彩；三是具有包容性和普惠性。

若无日本的参与，东亚新型国际秩序和“积极和平”便无从谈起。

1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8.